

紀念羅福頤先生

葉其峯 紀宏章

著名古文字學家、金石學家、篆刻家，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羅福頤先生因患癌症，醫治無效，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八日逝世。這一不幸的消息，實在使人難過，作為跟隨他工作多年的助手、學生，更由於失去一位好導師而悲痛萬分！

羅福頤先生，字子期，生於1905年，浙江省上虞縣人。先生從事金石文字之學的研究已幾十年，早在三十年代，就曾協助其父羅振玉編輯《三代吉金文存》這部劃時代的金文匯編，同時對歷史文物和古代文獻有廣泛的猶獵涉，為他以後的研究工作打下堅實深厚的基礎。幾十年來，先生幾乎都沒有離開過文物、考古的圈子。他兢兢業業，勤奮治學，給後人留下豐富的遺產。據初步統計，已發表過的專著有三十二種，論文四十多篇，對甲骨、金文、青銅器、石刻、簡冊、帛書、度量衡、造像、敦煌文物、東北歷史和明清檔案都有精辟的論述。在如此廣泛的門類進行研究並有所成就的學者是不多的。先生尤其在古璽印研究方面有重要貢獻。他早年所著的《古璽漢印文字徵》和《印譜考》，至今仍被認為是古璽印研究的權威著作，他的新著《古璽印概論》、《近百年來古璽印在學術上之進展》及其主編的《古璽文編》、《古璽匯編》，又把古璽印和璽印文字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。此外，先生對西夏文字和西夏歷史也有較深的造詣。他的《宋史夏國傳集注》被認為是一部很有價值的關於西夏歷史研究的著作。他新近完稿的《西夏官印集考》，不僅為研究西夏歷史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，還糾正了史書記載中的一些謬誤。先生還有很多沒有發表的著作。《中國之石刻》是先生繼《古器物學概說·石刻篇》以後的一部關於古代石刻研究的專著，《殷虛書契四編》匯集了先生幾十年辛勤蒐集的甲骨拓片，其中有不少罕世之品。《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彙編》則是一部珍貴的關於古代醫方的資料書。必須提到的，先生還有十幾種關於漢代簡冊的研究著作和資料彙集。先生很早就潛心鑽研漢簡，又是最先參加整理山東臨沂等地出土的漢簡的學者之一，先後發現和基本整理出《孫臏兵法》這部不朽的兵書和《尉繚子》等多種古籍殘篇。上述十幾種關於漢簡的書稿、大部分是當時的研究成果。先生在漢簡研究史上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。

先生治學態度嚴謹，講究實事求是，堅持言之有據，而反對任何疏空之談。為此，他一生勤於搜集學術資料，以作為自己研究工作的基礎。

先生對文物鑑定有很高水平，特別對甲骨、青銅、刻石、璽印、封泥、古陶磚瓦等

古代銘刻和器物，只要擺在面前，先生馬上就能辨別出它的真偽、時代和優劣。至今兩件罕見的北元遺物——“太尉之印”、“甘肅省左右司之印”，以及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官印“遼州之契”，就是先生從普通文物中發現的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珍品。更令人欽佩的是，先生對文物的鑑別，並不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上，而是上升到理論。先生的《周秦漢青銅器辨偽錄》、《古璽印封坭辨偽錄》等著作和文章，就是他對文物鑑定的部分總結。有的人能鑑定文物，但上升不到理論；有的人會寫文章，但對文物鑑定卻束手無策。像先生這樣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，又有廣博的古文獻知識，更能將自己的意見系統地表述，形於文字，是難能可貴的。

先生還精於篆刻藝術。他早年有《待時軒仿古印草》、《待時軒仿古別錄》等印譜行世。後來雖沒專事篆刻，但對這門藝術卻從沒荒疏，而且隨着對印學的研究不斷深化，其篆刻功力也日見精深。先生治印從不故作狂態，而把“宗秦法漢”作為自己的信條，着力體現古印的精神。他刻的印章，既有古銅印的質樸雄勁，更兼古玉印的典雅秀麗，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。

先生有強烈的事業心，又有堅持不懈的刻苦精神，這大概就是他在學術上和藝術上獲得如此巨大成就之所在。他從沒有節、假日的概念，每次到他家，幾乎都見他在伏案寫作。近年，他為完成主編《漢魏南北朝官印集》的任務，盡管已是七十多歲的高齡，還堅持每年到外地調查研究二至三次，而每次外出，他都帶上書籍和文稿，以便工作之餘進行寫作。即使在病中，他也不放鬆工作，精神稍好，便又幹起來了。我們常勸他要注意休息，他總說沒關係，已經習慣了。其實，他是在與自然規律搏鬥，想多爭取點時間，多做些事情。

先生一輩子都致力於整理文物的工作，也最關心文博事業的發展。為了促進文物研究工作，他曾經貢獻出很多自己用幾十年的時間積聚起來的寶貴的學術資料。他近年主編的《古璽匯編》、《漢魏南北朝官印集》，大部分資料是先生個人的。這些資料都是先生編書用的，有的已成書了，然而，先生為了使這些書得以充實、完備，就將這些資料全部送給故宮，由故宮重新編輯出版。此外，先生還多次把自己收藏的珍貴資料提供給研究機關或個人研究發表，新近出版的《甲骨文合集》、《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錄》，都有不少先生的捐贈。這種精神是很難得的，表現了一個大學者的寬闊胸懷。

先生對於自己收藏的文物的處理，也是從有利於文物研究工作的角度考慮的，他曾幾次捐獻文物給國家，這些文物都是他認為有重要價值的珍品。臨終前，他再次捐出一件他珍藏幾十年的珍貴文物——元代著名書法家顧善夫的寫經。他一再囑咐自己的子女，說這件文物原是清宮舊藏，一定要獻給故宮，以妥善保管。先生彌留之際，唯一惦記的仍然是這件事情。十一月七日晚，先生忽然要坐起說話，但是當時他說話已經不清楚了。守護在他身邊的子女，根據他嘴唇的動作，問他說的是不是元人寫經之事，先生點了點頭，當告訴他一定照辦時，先生才放心地躺下。真想不到這竟是先生最後的遺言，第二天，先生就與世長辭了。

先生生前的研究計劃很多，不少工作都來不及完成。他的逝世，實在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。我們向先生向學多年，記得先生曾向我們說過：“我不想把自己的知識帶進墳墓，只要你們學，我一定盡力幫助。”如今先生離去了，問學無人，怎不叫人悲痛！師生之情，恩深誼重，謹寫下這篇短文，以作為對先生的紀念。

